

眼界

严家炎

著

新楚文丛

郭枫

主编

非外借

眼界

严家炎

著

新地文丛 主编 郭 枫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眼界 / 严家炎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1

(新地文丛)

ISBN 978-7-5594-2861-5

I. ①眼… II. ①严…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评论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06.6②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6527 号

书 名 眼界

著 者 严家炎

主 编 郭 枫

责任编辑 王 青 黄孝阳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88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861-5

定 价 4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新地文丛”前记

郭 枫

我在 1956 年设立新地文学出版社，创办以纯文学为内容的《新地文学》月刊，并联合纯文学刊物《文学季刊》《笔汇》，汇集了台静农、徐复观、王梦鸥、何欣、郭枫、陈映真、齐益寿、黄春明、蒋勋等三十多位前辈与后进作家，创作写实作品，传递中国新文学薪火。

1983 年“新地”又创办《文季》双月刊，刊出许多反映现实的作品。如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反映美日在台企业劳工生活的情景；郭枫散文《老家的树》反映祖国人民抗战期间生活的情景（此书多篇被收入大陆各版本中小学教科书）。1986 年新地文学出版社又在台湾印行《当代中国大陆作家丛刊》，分七卷，收书七十部，包括：汪曾祺、王蒙、莫言、铁凝、王安忆、张承志等数十人的小说集，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诗集。对台湾文学承接祖国文学风格，产生相当的影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地”创办《新地文学》季刊，专登各地华文作家作品，又主办“21 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2010 年在台湾大学、2012 年在东海大学、2014 年在南京大学、2016 年在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另主办“世界华文古典文学会议”，2015 年在南京大学；“鲁迅文学国际研讨会”，2015 年在台北教育大学。

“新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新世纪当下，做了一些文学人生该做的工作，达成一些少年憧憬的文学梦想。说起来这条路崎岖坎坷，走了七十年差不多心力俱竭。然而，结识了许多杰出的好友，写出了一些时代的踪影；日之夕矣，犹能在文学园地干点活儿，实在得感谢苍天厚爱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意出版“新地文丛”套书，不仅在大陆出版界是饶有意义的壮举，也为两岸文学交流工作加上美好的一笔。我衷心敬佩，欣然同意主编丛书，并表示义务工作。承蒙海内外文友热情协助，半年时间“新地文丛”第一辑，已由江苏凤凰文艺同仁勤奋编制中。让我不禁赞叹，古城南京为中国文学名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驰名全国，盛誉非虚，其来有自。

——郭枫 2018 年 10 月 9 日深夜 南京

简介

郭枫(1930—)江苏徐州人，1949 年羁泊台湾。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著作 28 部。2016 年定居南京，偶为报刊写稿，担任全国台湾同胞联合会会刊《台声》杂志专栏作家，为南京大学特聘文学院客座教授。

目录

- 1 一个初冬夜晚的经历
- 5 回忆我和柳青的几次见面
- 11 心中的丰碑——哭王瑶先生
- 15 我所知道的吴小如先生
- 19 缅怀樊骏学长
- 25 缅怀王富仁教授
- 29 悼念杰出的诗人洛夫先生
- 36 《微神》：老舍的心象小说
- 46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艺术贡献
- 58 从《檀香刑》看莫言小说的贡献
- 68 试说“中国的奥勃洛莫夫”
——从《王蒙自传》谈到倪吾诚形象的典型意义
- 78 开拓者的艰难跋涉——论丁玲小说的历史贡献
- 108 论王蒙的寓言小说
- 125 让人很开眼界的校园小说
——谈竹林的《今日出门昨夜归》
- 128 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
- 139 唐弢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

- 147 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
——《黄衫客传奇》中译本序
- 157 《加拿大的中国基因》序
- 160 新体白话的起源、特征及其评价
- 182 荒诞又庄严的复仇正剧
- 199 闲话小说文体
- 207 试说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总体特征
- 225 论“五四”作家的文化背景与知识结构
- 244 走出百慕大三角区
——谈二十世纪文艺批评的一点教训
- 251 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

一个初冬夜晚的经历

那是1985年的11月末，刚进入初冬季节的一个午夜。我按照平时十二点休息的习惯刚躺到床上不久，突然听到急促响起的电话铃声。深更半夜来电话，当然为了十分紧迫的事。我随手披上床头放着的外衣，急忙起身接听，电话中传来的是北大党委原组织部部长兼人事处处长伊敏着急的声音：

告诉你一件意外的事，你们系的老先生——住在我对门的吴组缜教授昏晕过去，不省人事了，刚才他夫人过来敲门告急我才知道。据说很可能是胃出血，必须立即请大夫紧急抢救。可是他们的儿女都在外地，连一个在北京的外孙也不住这里，只有老两口自己在北大校内，所以必须靠中文系的人连夜出动才行。

放下电话，我本能地立刻想找系里管行政后勤工作的副主任耿明宏，与他商量怎样处理这件火烧眉毛的重大事情。但一看钟表，这时已是午夜零点三十五分。比我大几岁、身体又不算太好的耿明宏，此刻想必早已入睡。我想，与其把他从梦乡中叫醒而可能

延误时间，不如我自己立即和校医院负责人进行联系，采取行动。恰好一年半以前要我当中文系主任时，校长办公室曾发过一份学校各单位负责人的电话簿，我就找到校医院院长王慧芳家中的电话号码，给王院长打了电话，说了年已七十七岁的吴组缜先生的紧迫病情，请求她派位大夫进行抢救，并且告诉了吴家在朗润园9公寓的具体楼层和门号，明确说好我会在吴家门口等候大夫的到来（我做好了万一出现最严重的情况就需要用救护车将病人立即送往大医院的思想准备）。想不到王院长却诚恳爽朗地一下子把事情全揽到自己身上。她说：这么深更半夜的，派其他大夫出来比较困难。好在自己住承泽园，进西校门不太远，自己会立即骑自行车，携带医疗器械和药物，赶到吴先生家来抢救的。听她这么一说，我不觉肃然起敬，马上心情就稍稍放松了。于是快速穿好衣服，从中关村44公寓骑上自行车，叫开北大东门，先赶到了朗润园9公寓206室吴先生家中。吴师母沈菽园长期做北大教职员的家属工作，很健谈，带点皖南口音，那天却显得有些急促。她说：“吴先生过去就有胃溃疡病，常感不舒服。这次大便是黑中带青，我觉得不正常，就用陶盆接了一些。组缜自己总说是蔬菜吃多了，没关系的。现在却昏过去了，失掉了知觉。”她引我看了便盆，确实是深黑色的，不像一般的菜青色。这时，王慧芳院长也带着一袋器物进了大门。她认真察看了病人大便的颜色，就说：“这肯定是潜血，确实有问题，昏晕就因为失血过多。”她又观察了吴先生苍白带点蜡黄的脸色，轻轻把了一会儿吴先生的脉搏，点了一下头。随即用温开水给吴先生喂服了几种可能有助于止血的药片。然后，又开始为吴先生挂起瓶来输液。这一过程很长，也很缓慢。约有一个多

钟头以后，吴先生脸上的气色有些变化，苍白、蜡黄的颜色逐渐减退了。又过了二三十分钟，吴先生慢慢睁开眼睛，终于醒了过来。看到一位女大夫正为自己输液，他动着嘴唇极轻微地说了一声：“多谢大夫！”吴师母在旁补了一句：“这是校医院王院长亲自在夜半时分来抢救你的，系里也为你费了心。”王院长怕吴先生再说话，赶紧制止道：“您太虚弱，别再说了，还是闭目养神为好！”又向吴师母问了些情况。大约到凌晨三点四十分左右，王院长看着输液快要结束，估计吴先生的病情暂时已经稳定，不致再有坏的变化，便把吴师母和我轻轻拉到门外，悄声交代：“天明以后，你们还得准备把病人送进北医三院住院部，经过仔细认真的检查，再由他们的消化科主任大夫决定是否需要做胃部溃疡切除手术。”

这样，三点五十分左右，王慧芳院长和我两人才告别了吴先生与吴师母，离开了朗润园，骑着自行车在未名湖北岸那里分手回家。临别前，我代表中文系和吴先生一家，向王院长表达了最诚挚和深切的感谢，尤其对她为抢救病人而牺牲自己的睡眠、主动承担责任的崇高精神表示了极大的敬意，并请她回家好好休息，保重身体。

清晨6点多，我给耿明宏副主任打了电话，把夜里吴组缙先生的病情、抢救以及王院长的嘱咐，源源本本说了一遍，请他先去北医三院办好手续，然后再将吴先生送进医院。大约六天之后，吴先生果真在三院动了胃溃疡切除手术。吴先生在外地的三位子女和亲属，都到北京来看望。在云南工作的长公子吴葆羽，自己就是一位医生，他在吴先生动手术时就对我说：父亲经过这次手术，至少会延长七八年寿命。葆羽说得很准：吴组缙先生果然到1994

年——也就是经王慧芳院长抢救和北医三院手术后九年，才以八十六岁高龄辞世的。他在晚年还为北大中文系的教学和研究，为国家的学术事业和文学事业，做出过许多重要的贡献^①。其中都含有医护工作者不可磨灭的功劳。

在北医三院为吴先生做了胃溃疡切除手术几天之后，我去病房看望了组缙师。他比过去略显清瘦，但是很有精神。一见面，他就紧握住我的右手，表示要谢“救命之恩”。我慌忙摇摆着左手告诉他：“不该这样说，我们都是您的学生，只是做了一个学生在当时情况下都会做的事。真正要感谢的，是校医院的王慧芳院长，她在为人、医术、医德三方面都很好，真值得我们学习。还要感谢三院这次为您做手术的大夫和护士。”我还告诉组缙师，什么时候有空了，我说不定会把王院长那个晚上感人的事写成一篇文章。他含笑点点头。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当初许下的愿至今还是空的。现在百年系庆，趁这个机会逼着自己写上两三千字，或许也是还愿的一法吧！

① 我在这里说的并非只是礼貌性的虚话。如果有人采访北京市文联原副主席、党组书记宋汎（宋丹丹的父亲），他就能极生动地介绍出吴组缙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评级会上的一番精彩演讲。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组缙师在文学界那种为他人所无法替代的重要性。

回忆我和柳青的几次见面

我虽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就读过柳青的《种谷记》《铜墙铁壁》等作品，1960年起还研究《创业史》并陆续写过几篇评论，但我和柳青本人有机会见面，却在他于《延河》上发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的四年之后。

那是1967年的8月初，我去西安作协机关住下后的第二天晚上。

西安地区天气竟是这么炎热，白天太阳底下晒着犹如烧烤，天黑下来却还酷热得难以忍受。已是晚上大约八点钟了，仍然没有多少凉意。坐在室内想写点东西，挥汗如雨，手臂与纸张接触的地方全湿透了。连灯下看东西也不断冒汗，真恨不得浸泡在冰水里才好。于是只好走到室外去乘凉。

一位约莫五十多岁、理着平头的老汉，坐在院中水泥池边上，他也正在纳凉。

我曾听人说过，柳青因“文革”中受到冲击，已和他的家人离开了长安县的家，住进了西安作协所在地，集中起来参加运动。他每天负责打钟，给作协机关报时间，莫非这位老汉就是他？

于是我走过去，有点冒失地发问：“您是柳青同志吗？”

“是。您贵姓？”

“我是严家炎。”我伸出手去。

老汉也伸出他的手，和我握着说：“啊！昨天听人说你到这里来了。咱们这是第一回见面吗？你来西安几天了？”

“昨天下午刚到。”

“西安天气和北京不大一样，夏天热得厉害。”

“是啊。早上还算凉快，白天和夜间都很热，真是大陆性气候。”

“倒不是因为离海远，还有一些具体的气候条件。”

于是，他打着手势说起影响西安这一带的气候条件来了：高大而绵延不绝的秦岭山脉如何围挡在从西南到东南的方位，西南与南方来的温湿气流如何受到阻隔，形成了西安地区暑天的蒸笼效应……他讲得非常通俗易懂，又相当准确到位。

我从《创业史》中知道柳青对这一带地理、气候条件是熟知的，但熟悉到这种如数家珍的程度，理解得这么透彻，却出乎我的预料。他使我惊奇不已。

我问他近期身体状况。他告诉我，自己患的是季节性哮喘病，每当受到某些花粉或其他说不清的细小物质的感染，就容易引发很难受的哮喘，因此总得时刻小心，但眼下情况还算可以。当前使他感到着急的，倒是另一件事：《创业史》第二部的稿子找不到，被某大学的“造反派”学生抄家时抄走了，现在不知落在何处。他担心会不会丢失。我听着也感到意外，甚为关切，却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能向他建议，可物色熟悉该大学情况的人先去询问^①。

^① 据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审王维玲先生后来告诉我：被某大学“造反派”抄走的《创业史》第二部的一箱草稿，最后由另一派大学生中名叫张长昌（现已去世）的同学从一大堆杂物中找出，并交还到柳青手中。

大约聊到晚上9点左右，由于又到了应该打钟的时刻，柳青先与我分手道别，离开水泥池边打钟去了，我也回到了自己休息的房间。

第二天晚间，我和柳青又在纳凉时见面。他向我问到《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写作和发表的情况。他问我：“那时你为什么要写批评梁生宝形象的文章？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某位领导人授意——比方说像林默涵这样的人物支持你写？”我告诉他：“没有任何人指使我写这篇文章，我仅凭自己阅读《创业史》的艺术感受，而且是把作品读了两遍，做了许多笔记才形成的一些看法，总想把它写出来。在我的感觉中，《创业史》里最深厚、最丰满的形象确实是梁三老汉；梁生宝作为新英雄形象也有自己的成就，已在水平线之上，但从艺术上说，还有待更展开、更充实、更显示力度，眼前仍比不上梁三老汉，因此，不写就觉得手痒痒的。只是我那篇文章中有些措辞可能不太妥帖，斟酌得不够，直来直去，像‘三多三不足’之类。”柳青问：“你当时多大？”我告诉他：“那时二十七八岁。”又补充说：“有关《创业史》的最初三篇文章，都是1960年冬天到1961年夏天写的。《文学评论》编辑部起先对刊发梁生宝这篇有点犹豫，搁了一段时间，延到1963年才发表。”柳青马上说：“如果是这样，看来我对这件事有点误解了。我总以为，批评梁生宝形象的那些意见不是你个人的意见，而是有人想借此来搞我，因此才在《延河》上发了那篇《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他又补充说：“你谈梁三老汉那篇文章的看法，我是同意的，当时我跟《文学评论》的编辑同志也说过。”“是跟张晓萃同志说的吧？”“是，一位女同志。”

随后，柳青还很有感慨地说：“在我们国家，一部作品无论怎么

走红,好像也红不过五年。现在有人又主张‘工农兵文艺’了,这种说法我不赞同。过去延安讲‘文学的工农兵方向’,那还宽一点。1949年以后讲‘人民文艺’‘人民文学’,我的理解是更宽广了,现在怎么又退回到‘工农兵文艺’的道路上去呢!这样下去,我这个作家感到自己实在很难适应今后的创作要求了。”

次一天的午后,柳青要一位家人来邀请我到 he 暂住的家中去吃西瓜,我见到了他夫人马葳和全家人,聊了一会家常话,感到很亲切。

临离开西安前,我与陕西作协“红色造反派”负责人之一的陈贤仲交谈了一次。我说了我个人的看法:建议对柳青这样的作家,应该早早解放。即使柳青比较崇拜肖洛霍夫,在家里挂他的像,恐怕也算不上是多大问题。陈贤仲也点头表示赞同。

1972年,我在自身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故之后,于一个偶然的机缘,获知柳青夫人马葳前些年受迫害致死的消息,感到十分震惊和哀伤。我辗转相托,请人给柳青带去一本书,曲折地向他表达自己一点抚慰的心意。

真正与柳青第二次见面,已是“四人帮”垮台后的1978年。柳青当时因花粉过敏、哮喘病严重发作而住在北京朝阳医院,我和新华社徐民和相约一起去看望他。柳青鼻子上虽然插着氧气管,见到我们后谈话的兴致却很高。他告诉我:“前几年因病来京住院时,很想见你一面,但未能联系上。”柳青这次谈话的中心,是做人的态度问题。他以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作为例证。他说:“做人,总要有个原则。是一时迁就,随便表态好,还是坚持原则,看似顽固,不肯检讨,实际却坚持应该坚持的东西,符合革命的利益,究

竟哪一种好？我是要坚持后一种的！不要不甘寂寞！郭小川闲得发痒，写了个《笨鸟先飞》，结果出了事。人家根本不要你，你何必凑上去呢！”又说：“我为什么不检讨？因为检讨之后就会被结合进革委会，我不愿意被结合进去。”

柳青还说到自己“文革”前在家中挂肖洛霍夫像的事。苏联曾有人认为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偷用了别人的稿子，但斯大林站出来保护了肖洛霍夫的名声，否定了此案。几十年后苏联又有人重新提出此案，加上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的一切都等同于“修正主义”，于是“文革”中的柳青就蒙上了双重“罪名”。但柳青处之泰然。他说：“我认为，学习创作的途径，除了从生活中学习，只有读作品。一部好的作品能带出一批年轻作家。1963年在成都一次会议上，当着周扬、林默涵的面，我就讲过这条意见。”他转而问我：“你是搞理论、评论的，我不知你同意不？”我向他连连点头，表示自己是赞同的。

柳青又说：“肖洛霍夫偷别人稿子可能不可能？不能说绝对不可能。斯大林想保护肖氏这样的名作家，与他自己的性格也吻合。但这能算是我的问题吗？”

可惜的是，柳青过早去世了。他不知道，在苏联，人们最后找到了肖洛霍夫创作《静静的顿河》的原稿，终于为肖洛霍夫洗去了别有用心的强加给他的“污点”，也为柳青洗去了莫须有的“罪名”。

我们看柳青说得很多，很激动，怕把他累着了，就劝柳青别说了，暂且休息一会。由徐民和向柳青介绍了刚开完的文联扩大会议的情况。柳青说：他相信“文艺界的事还在发展”。历史证明，柳青的预言完全正确。

最后,我还想记述自己作为中国作协代表团成员参加“丙戌清明祭扫黄帝陵墓仪式”之前在西安去柳青墓前祭扫并有幸见到柳青女儿刘可风女士,以及当晚和刘可风女士交谈的情况。下面不妨抄引我2006年4月4日的一段日记:

晚间,省作协在宾馆设宴招待京中来人,省委宣传部正副部长马、白均出席。省作协主席陈忠实、马部长、张锲团长先后致词,省作协多位成员及柳青女儿刘可风也参加。会后刘可风访问了我,问了我1967年夏去柳青家与他父亲谈话的情况(她事先已问过陕西作协的王宗元),也谈了她在柳青晚年患病期间与父亲的对话。她说她曾向其父表示,她同意严家炎对梁生宝形象“三多三不足”的批评,柳青有点感到意外,后来柳也承认“理念”写得过多等缺点,认为严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严的语气有挖苦嘲讽之处使他接受不了,他后悔自己所写《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的文章。刘可风赞同今天张锲在柳青墓前讲的严是柳的“诤友”的提法。

我觉得,可风女士和张锲先生这番谈话,也许可以作为本文所涉问题的结论。